

Doi: 10. 11835/j. issn. 1008-5831. pj. 2025. 04. 006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政,程梦瑶,郑霖豪. 美加征关税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24-135. Doi: 10. 11835/j. issn. 1008-5831. pj. 2025. 04. 006.



Citation Format: XU Zheng, CHENG Mengyao, ZHENG Linhao. Strategic cho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 economy under the U. S. tariff imposition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4): 124-135. Doi: 10. 11835/j. issn. 1008-5831. pj. 2025. 04. 006.

美加征关税背景下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徐 政¹,程梦瑶²,郑霖豪³

(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2.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108;
3. 福建投资集团 闽投研究院,福建 福州 350005)

摘要:2025年以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加速推进,出于平衡贸易逆差与实施保护主义的经济动因、重构全球产业链与减少对华依赖的战略动因、转移国内矛盾与地缘政治博弈的政治动因以及阻滞技术跃迁与维持代际优势的科技动因,已超越传统贸易摩擦范畴,形成经济、战略、政治与科技多维度联动的系统性压制工具。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将使中国民营经济面临供应链承压(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出口遇阻(传统市场空间压缩)、技术受遏(创新生态链式断裂)与人才流失(遏制高端智力流入)的系统性风险挑战。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亚洲安全模式”,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区域治理规则的战略升级,为民营经济突围提供新范式。基于此,文章聚焦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的战略转型路径选择,提出“改革开放—政企协同—市场开拓—风险防控—创新驱动”的五维战略框架,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完善制度性保障政策、加大对民企扶持力度,强化多边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健全外贸预警、强化法律支撑保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人才建设生态等方式突破封锁。这种转型不仅为我国民营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战提供实践启示,更通过制度型开放倒逼国际规则创新的尝试,为新兴经济体突破“中心—外围”依附格局提供中国方案。唯有将改革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体系重构,才能将关税危机转化为规则重塑的历史机遇,这既是应对单边霸权的现实选择,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抉择。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亚洲安全模式;民营经济发展;双循环战略;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757. 12;F752. 7;F121. 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4-0124-1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专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内涵及因地制宜发展路径研究”(STA-04)

作者简介:徐政,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南京大学博士后,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生态环境厅基地特约研究员,河北省重点高端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807211542@qq.com;程梦瑶(通信作者),经济学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Email:chengmengyao@ruc.edu.cn;郑霖豪,经济学博士,福建投资集团闽投研究院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25年初,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政策呈现阶梯式升级态势。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2月启动首轮10%关税加征,2025年3月实施第二轮10%附加关税,2025年4月3日进一步将特定商品税率提升至34%,再加上2025年4月9日加征的50%,在最新一次上调后,美国对华商品实际征收关税总额累计已达145%。作为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于2025年4月4日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并于2025年4月11日起将税率上调至125%,这种关税博弈已超越传统贸易争端范畴,凸显美国系统性重构全球贸易规则的战略意图。

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建立在深度互嵌的全球价值链之上^[1]。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美两国商品贸易总额达6 88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5 247亿美元,进口1 637亿美元,形成3 610亿美元顺差。尽管对美直接出口仅占中国总出口的14.67%、GDP的2.77%,但通过东盟国家进行原材料、设备及半成品转口的间接贸易规模显著提升。这种“表面第三国,实质中国造”的贸易模式,既反映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也暴露现行贸易体系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脆弱性^[2]。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有近800家中国企业先后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涉及AI、生物医药等14个战略领域。技术封锁与关税壁垒的叠加效应正在重塑东亚产业链格局。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退潮趋势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加速演进,这种规则重构对中国民营经济形成双重压力:一方面,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折射出市场信心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外贸作为“三驾马车”中唯一的强劲引擎面临失速风险,若美国消费需求下降,将直接冲击中国外贸关联企业的生存空间。

2025年4月8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对我国未来周边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并首次提出“亚洲安全模式”,为亚太区域治理提供了新理念,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主动塑造新型区域秩序的战略转向^[3]。在此背景下,探究中国民营经济的战略转型路径具有迫切现实意义。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已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作为外贸“主力军”,2024年,民营企业进出口24.33万亿元,同比增长8.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5.5%。民营企业的角色正从富士康模式的“世界工厂”代工者向Shein、大疆等自主品牌出海跃迁。

综上,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加征关税的动因解析与中国民营经济面临风险挑战的探讨,为中国民营企业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突围路径参考,这既是维系城镇就业人口稳定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4]。

二、美加征关税的动因解析

(一)经济动因:平衡贸易逆差与实施保护主义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经济动因,根植于其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平衡结构性贸易失衡与缓解财政可持续性危机的双重诉求^[5-6]。这一战略的逻辑起点是,美国长期深陷贸易逆差与债务膨胀的恶性循环。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暴露出制造业竞争力衰退,而联邦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失控则迫使政府寻求非传统财源。

从贸易失衡视角看,美国对华巨额逆差被视为不公平贸易的象征^[7]。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4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增加17%,达到9 184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 954

亿美元,占总逆差的32.1%。中国在机械装备、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出口优势,被归因为产业补贴、技术转移等非市场因素,而非全球分工的自然结果。特朗普政府将关税作为矫正工具,试图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竞争力,同时倒逼制造业回流。例如,对汽车、半导体等逆差核心领域加征高额关税,既是对本土产业的防御性保护,也为重塑高端制造业优势争取窗口期^[8]。财政压力进一步催化了关税的工具化转向。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2024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为1.8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1380亿美元,增幅为8%,国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占GDP123%)。在利率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联邦债务的不断增加引发了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利息支出占比持续攀升,使关税收入成为缓解财政危机的速效药。通过设立对外收入局等机构,美国以关税形式向主要顺差国征收特别费用来填补收支缺口^[9]。这种政策本质上是将国内经济治理失败的成本转嫁给贸易伙伴,以维系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短期稳定。

更深层次看,关税政策折射出美国对全球化红利的再分配焦虑^[10]。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分工,在现实中演变为“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单向依赖,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力衰退加剧了失衡。特朗普政府以选择性脱钩打破既有分工体系,通过对碳纤维、半导体等关键材料的进口限制,人为抬高竞争对手的供应链成本,试图重构“美国研发—全球代工”的新型垄断格局^[11]。这种背离自由贸易原则的操作,实质是以规则霸权替代市场竞争,掩盖其创新动能不足的结构性缺陷。美国的保护主义转向,本质是经济霸权衰落的应激反应。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杠杆实现短期缩小贸易逆差、中期缓解财政压力、长期重塑产业竞争力的三重目标^[12]。然而,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早已超越单边政策所能切割的范畴,强制“再平衡”只会加剧全球经济体系的碎片化风险。

(二)战略动因:重构全球产业链与减少对华依赖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战略动因,本质是通过重构全球产业链秩序与削弱对华依赖,重塑其对全球经济的主导权。这一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以国家安全为名,将贸易政策工具化,形成“施压—谈判—重构”的三步联动机制,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规则体系的“美国中心化”^[13]。

首先,以关税为杠杆推动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重组。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强制规定汽车零部件“北美本地化生产比例不低于75%”,实质是将北美价值链与亚洲供应链切割,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这种区域化重构不仅服务于产业回流目标,更通过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条款巩固美国规则话语权,为技术封锁提供制度支撑。

其次,借疫情暴露的供应链脆弱性加速“去中国化”^[14]。新冠疫情暴露出美国医疗设备、稀土等关键领域对华高度依赖,迫使美国以“经济安全”名义推动战略产业回流。通过《国防生产法》要求药品、半导体等产业本土化,并联合盟友,试图用越南、印度的替代产能填补中国空缺。这种政策既是对供应链风险的应激反应,更是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系统性布局^[15]。

再次,关税成为重构贸易规则的经济武器。美国将加征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贸易伙伴在规则让步与经济损失间权衡。例如,通过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迫使后者降低对美商品壁垒;利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迫使中国扩大采购规模,短期缩小贸易逆差。这种“关税换让步”策略的本质,是以经济胁迫重塑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条件,同时为本土产业争取转型窗口期。

最后,将产业链安全与国家安全深度捆绑^[16]。美国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为由,将关税政策外延扩展至边境管控、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领域。例如,以加征关税施压墨西哥加强边境管理,将移民

问题与贸易利益挂钩,实质是将经济手段泛安全化。这种“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逻辑,不仅为单边制裁提供合法性外衣,更试图构建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2.0体系。美国的战略动因折射出其霸权护持的双重焦虑:一方面,中国在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威胁其规则制定权;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相互依赖削弱了其传统控制力。通过关税推动的产业链重构,本质上是一场“规则洗牌”与“权力再分配”的博弈,其成败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格局^[17]。

(三) 政治动因:转移国内矛盾与地缘政治博弈

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政治动因,本质上是国内社会裂痕与国际权力博弈双重挤压下的策略选择。随着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催生了民粹主义政治。特朗普政府敏锐捕捉到蓝领工人的集体焦虑:制造业岗位流失、社区衰败与全球化挫败感交织成“被遗忘者”的身份危机。在此背景下,关税政策被异化为“政治盾牌”,通过将中国塑造为外部威胁,将民众对资本垄断、技术替代等深层矛盾的情绪,转嫁为对不公平贸易的简单化叙事^[18]。通过加征汽车、钢铁等象征性行业的关税,特朗普向选民传递“强硬护工”形象,尽管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低于宣传规模,却成功激活了关键摇摆州的政治认同。例如,在制造业岗位流失严重的密歇根州,通过关税议题包装的“对抗中国”口号,使蓝领选民支持率显著提升^[19]。蓝领工人普遍认为全球化仅服务精英阶层,保护主义成为他们重拾尊严的精神寄托,这种“情绪优先于事实”的选举操弄契合了他们被抛弃的心理。特朗普政府通过提高汽车、钢铁等标志性产业进口关税,塑造出“保护本土就业”的强势形象。这种策略虽然实际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远低于宣传目标,却在密歇根等制造业衰退严重的关键摇摆州取得显著政治效果^[20]。密歇根州蓝领群体的支持率因关税政策显著提升,深陷失业困境的产业工人将中国视为就业流失的替罪羊,他们普遍认为全球化红利被精英阶层垄断,而贸易保护政策则成为重获尊严的情感寄托^[21]。这种利用经济焦虑的选举策略,本质上是将复杂的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化为民族主义情绪动员。

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层面,关税战成为美国重构国际权力秩序的工具。通过瘫痪WTO争端解决机制、推动《美墨加协定》等排他性条款,美国试图将多边贸易体系改造为单极主导的规则网络。这种转变具有双重遏制意图:一方面以“实体清单”封锁中国科技企业,延缓产业升级步伐;另一方面通过关税杠杆迫使盟友选边站队,构建对华技术包围网^[22]。当中国在5G、新能源等领域突破技术代际封锁时,美国选择以规则破坏替代公平竞争,试图维系摇摇欲坠的全球主导权。这种政治动因驱动的关税政策,本质上是以短期选举利益置换长期发展理性的零和博弈。通过将“反关税”等同于“不爱国”,将“自由贸易”污名化为“精英背叛”,特朗普成功将贸易政策异化为凝聚民粹共识的符号^[23]。这种策略虽能收割即时政治红利,却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割裂与对抗,最终可能反噬美国自身的技术创新与市场活力^[24]。

(四) 科技动因:阻滞技术跃迁与维持代际优势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科技动因根植于其维系全球技术霸权的深层焦虑。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美国长期主导的“技术代际优势”面临消解风险^[25]。中国光伏产业占据全球80%的产能,高端算法在多模态大模型测评中超越国际头部产品等事实,标志着中国正从“技术跟随者”向“技术创新者”跃迁^[26]。这种创新能力的非线性提升,触发了美国作为技术垄断者的恐慌,既担忧中国颠覆现有技术秩序,又恐惧自身丧失创新红利分配权。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关税从贸易工具异化为“技术隔离墙”,试图通过三重压制阻滞中国技术跃升:(1)针对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加征高额关税,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成本;(2)以“国家安全”之

名扩大实体清单管制,切断中美在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渠道;(3)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向本土企业注入巨额补贴,扭曲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规则。“关税筑墙+管制断链”的组合拳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固化了“中心一边缘”的技术分工体系,迫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低附加值角色^[27]。

美国的科技遏制战略暴露其内在逻辑悖论:一方面,其技术霸权依赖全球创新网络的开放协作,需借助中国庞大的应用场景验证技术可行性;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策略封锁技术扩散,维持单向竞争优势。这种矛盾在数字领域尤为显著——中国人工智能论文引用率已与美国持平,但中美科研合作占比断崖式下降,折射出技术“脱钩”对全球创新生态的破坏^[28]。历史经验表明,技术代际优势的维系需持续迭代而非封锁压制,美国逆全球化操作虽可短期延缓竞争者步伐,却可能因封闭体系丧失创新活力,最终动摇其霸权根基^[29]。

三、美加征关税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险挑战

(一)供应链承压:生产成本持续攀升

美国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通过供应链成本传导机制对中国民营企业形成系统性冲击。关税壁垒不仅直接推高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价格,更通过产业链重构压力、汇率波动及技术壁垒的三重叠加效应,导致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持续攀升。

首先,美国加征关税会直接带来进口原材料价格暴涨与替代成本激增。美国加征的关税显著抬高了半导体、精密仪器等关键进口商品的价格。部分依赖美国供应商的民营企业采购成本同比大幅上涨,且短期内难以找到同等技术水平的替代来源。即便企业尝试转向欧洲或日韩市场,认证周期延长与运输成本的增加形成了新的障碍,进一步加剧国内供应链压力。大豆等农产品和化工原料的进口受限,导致国内替代品供需失衡^[30]。

其次,产业链外迁引发的配套成本失控。为规避关税,民营企业被迫将产能向东南亚或墨西哥转移,但产业链配套设施的缺失导致隐性成本飙升,形成“越转移越亏损”的恶性循环。此外,汇率波动与避险成本还将侵蚀利润空间。关税政策加剧的汇率波动迫使企业增加外汇套期保值支出。中小微企业甚至出现“利润不足以覆盖避险成本”的极端案例。同时,美国技术封锁导致部分高端设备维护费用激增。

值得注意的是,低端产业链转移陷入“双重陷阱”: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承接产能却面临美国的高关税(如柬埔寨),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国内传统制造业外迁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流失,东莞电子产业集群产能利用率大幅下跌。这种“成本刚性上升—转移收益递减”的恶性循环,正在侵蚀中国民营经济的比较优势根基^[31]。

(二)出口遇阻:传统市场空间压缩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直接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成本优势丧失,传统核心市场空间加速收窄。这一冲击不仅表现为订单流失与利润压缩,更通过产业链重构、区域分化及技术壁垒等传导机制,对我国民营经济形成系统性挑战。在关税冲击下传统市场出现结构性收缩,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优势瓦解,净利润由正转负,订单将转移到其他国家^[32]。同时,传统出口导向型产业链的迁移引发“断链”风险。全国范围内,机电、纺织等行业可能因出口萎缩导致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对中国出口市场的挤压效应已从局部领域向全局蔓延,除了替代效应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高端制造业面临“技术性出口封锁”的双重困境,技术密集型产业正经历“中等收入陷阱”前

兆。市场空间的系统性收缩倒逼产业链被动调整,美国关税壁垒迫使企业陷入“内卷—出海”循环。这种“高端失守、低端分流”的格局,预示着中国民营经济亟需在价值链重构中寻找突围路径。美国关税政策对传统市场的压缩,实质是全球化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中国民营经济唯有通过“市场空间重构—技术能力跃迁—制度开放突破”的三维变革,才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这既需要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更需政策层面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最终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布局”的战略转型^[33]。

(三)技术受遏制:创新生态链式断裂

美国对华加征的“精准关税”政策,以技术遏制、产业链重构与市场挤压三重传导机制,导致中国民营经济创新生态的链式断裂。这种断裂不仅表现为关键技术的研发迟滞,更引发人才流失、协同失效与标准边缘化的系统性风险^[34]。美国关税政策将导致我国核心设备断供与研发进程受阻。美国对7纳米以下制程芯片、光刻机配件等关键设备加征的关税,直接抬高了民营企业技术迭代的成本,导致国产替代进程滞后,更严重的是,技术封锁将引发“替代成本陷阱”。同时,关税导致的净利润率下降迫使企业缩减研发预算。这种“研发停滞—人才流失—竞争力衰减”的链式反应,已使许多科创型民企陷入“技术空心化”危机。此外,美国通过关税捆绑技术壁垒(如要求出口产品符合FCC新规),迫使中国民营企业退出国际标准竞争。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正引发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技术封锁与市场挤压形成双重压制。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领域,这种“精准脱钩”策略导致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周期大幅延长。美国关税政策对创新生态的链式遏制,本质上是全球科技主导权的争夺。中国民营经济唯有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制度创新激活—全球治理参与”的三维变革,才能将技术封锁压力转化为生态重构动力。

(四)人才流失:遏制高端智力流动

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政策持续升级的背景下,高端人才流动的阻滞已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与抗风险能力高度依赖高端智力资源的积累与配置。美国通过精准关税政策、技术壁垒设置及产业链重构压力,形成对高端人才流动的系统性遏制。一方面,美国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税政策具有明确的技术遏制导向,迫使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科技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东南亚或墨西哥。另一方面,关税政策加剧的汇率波动进一步侵蚀企业现金流,迫使企业缩减研发投入使原本用于人才激励的预算被迫转向短期生存性支出,导致核心技术人员因薪酬竞争力下降而流向跨国公司或海外市场,削弱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35]。高端人才流失直接导致技术迭代速度放缓。这种迟滞状况在光刻机、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尤为显著,使民营企业难以突破价值链中低端锁定。此外,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性与政治化特征(如“对等关税”机制包含动态调整条款)加剧市场预期紊乱。高端人才对职业稳定性的敏感度使其更倾向选择政策环境稳定的跨国企业或海外机构。此类产业转移往往伴随核心研发团队的海外派驻,形成“产能转移—智力流失”的负反馈循环。美国关税政策对高端智力流动的遏制,本质上是全球创新主导权的争夺。这种“人才战争”的胜负将直接决定中国民营经济能否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四、美加征关税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改革开放: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面对美国系统性关税施压,中国需以“双循环”战略为轴心,通过改革开放重构内外联动的经济

韧性体系。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以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外部市场波动,以国际循环开放性拓展新兴增长空间,形成“内需驱动—区域协同—规则重塑”的立体化突围路径。

深化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释放内需潜能与产业升级协同共进。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激活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中的消费升级需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重点布局智能家居、绿色建材等民生领域,引导企业将过剩外贸产能转向内需适配产品的研发生产。同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高效流通,为民营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强化区域小循环,需构建“中国+周边”的产业链协作网络。依托RCEP、金砖合作等多边框架,推动与东盟、中东欧等区域形成深度绑定的产业共同体。通过技术输出、产能共享等模式,在东南亚建立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基地,在中东欧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中心,形成“中国研发—区域生产—全球分销”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这种区域化布局既能规避单边关税壁垒,又能通过原产地规则优化降低贸易成本,实现供应链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为提升供应链韧性,针对关键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的问题,鼓励企业在拉美、非洲等地探索多元化原材料采购渠道,建立战略资源储备机制。

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是双循环落地的核心保障^[36]。政府应动态优化出口退税与关税对冲工具,对深耕新兴市场的企业给予长期信贷支持。通过设立“产业链安全基金”,重点支持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行业的国产替代与技术攻关。建立外贸风险联防联控平台,整合海关、税务、商务部门数据,为企业提供实时政策预警与应对方案。通过上述改革举措,中国可构建“以内促外、以外强内”的双向循环格局:对内培育超大规模市场的虹吸效应,对外塑造区域经济治理的规则话语权。这种转型不仅是对关税冲击的战略回应,更是以制度型开放推动“亚洲安全模式”落地的重要实践,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包容性增长的新动能。

(二)政企协同:完善制度性保障政策,加大对民企扶持力度

面对美国关税政策的结构性冲击,中国需构建“政策护航—体系重构—战略反制”的协同框架,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增强民营经济韧性。强化财税金融协同支持是稳固企业信心的首要举措。应优化出口退税机制,针对受关税冲击严重的行业提高政策响应速度,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在关键技术替代与新兴市场开拓中的先期投入。同步扩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范围,将跨境电商、数字服务等新业态纳入风险保障,形成多层缓冲机制。通过政策性银行定向融资支持,可缓解企业转型升级的资金压力,重点向高端制造、绿色技术等领域倾斜。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37]。我国依托RCEP等区域协定,可以推动民营企业与东盟、金砖国家构建“产业链共同体”,通过产能共享、技术协作等方式降低贸易壁垒,实现合作共赢。在东南亚、拉美等战略区位,可以建设联合制造园区,整合我国的技术优势与当地要素资源,生产符合多边原产地规则的商品,有效规避单边关税限制。同时,有序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鼓励企业在区域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逐步打破对于美元的支付依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需政企双向发力。实施重点领域强链补链工程,通过“揭榜挂帅”机制推动龙头企业联合攻关核心技术,在京津冀、粤港澳等创新高地建设产学研协同基地,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建立产业链韧性评价体系,将关键设备国产化率等指标纳入考核,形成政策倒逼与市场激励的协同效应^[38]。

此外,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是应对国际规则博弈的基础支撑。通过建立国际贸易合规服务中心,为外贸企业提供反倾销应对、技术标准认证等专业指导,系统培养涉外专业法律人才。为了有效针对突发性关税加征,需构建快速响应机制,整合财税救济、市场转移等应对方案,最大程度减少外贸

企业的损失。同步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对因技术封锁导致生产中断的企业,提供过渡性支持,维持产业链基本运转。

(三) 市场开拓:强化多边合作,坚持共建“一带一路”

当前全球经贸体系正经历“规则重构”与“权力再平衡”的双重变革,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本质是试图通过“规则武器化”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将中国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这种系统性压制不仅体现为关税壁垒的层层加码,更延伸至技术标准、绿色认证、数字规则等非传统竞争维度。伴随全球化的退潮趋势,传统全球化模式加速向“区块化”演进。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它不仅是市场空间的物理延伸,更是中国参与规则博弈、对冲单边主义的核心载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支点,中国民营企业可构建“区域深耕—技术赋能—规则联动”的市场开拓体系,将外部压力转化为重构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战略机遇。

一是深化区域市场布局需从“分散突破”转向“生态共建”。在东南亚、中东欧等共建“一带一路”地区,民营企业应推动“产业—基建—服务”三位一体的市场渗透模式。以东盟汽车市场为例,可整合国内新能源整车技术、东南亚电池原料供应、中东欧高端零部件制造等资源,构建跨区域产业协作网络,通过在当地设立技术转移中心,输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解决方案,帮助东道国提升产业链层级,形成“中国技术+区域生产”的利益共享机制。同时,参与东道国港口、物流园区等基建项目时,可同步推广中国5G通信标准、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将硬件建设与数字规则输出相结合。例如,在非洲数字自贸区建设中嵌入“北斗导航+电子关锁”技术体系,为后续跨境电商规则制定奠定技术基础。针对中亚、西亚等新兴市场,可探索“工程承包+运营服务”一体化模式,如,承接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后提供长期的智慧运维服务,通过数据接口标准化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逐步掌握区域能源互联网规则主导权^[39]。

二是构建弹性供应链网络需平衡“效率优先”与“安全冗余”。应对“友岸外包”政策冲击,民营企业应建立“双枢纽—多节点”的供应链韧性框架。在墨西哥、越南等战略区位设立“跳板型”制造中心,重点布局汽车零部件、消费电子等关税敏感产业,通过“模块化”生产设计将核心工序保留在国内,通用环节前移至枢纽工厂,既满足原产地规则,又避免技术外溢风险。与此同时,可建立“国内中心仓—区域分拨仓—海外终端仓”三级库存网络,利用大数据预测区域市场需求波动,在东南亚枢纽仓储备高关税敏感商品,通过跨境电商小包直邮规避大宗贸易限制。针对欧美碳关税等技术性壁垒,可在东盟生产基地推广“零碳认证”生产工艺,例如,将中国自主研发的氢基炼钢技术移植至马来西亚工厂,同步申请国际绿色认证,使产品同时满足欧盟CBAM标准与东盟区域贸易规则^[40]。

三是强化内外循环协同需实现“需求互哺”与“能力迭代”。国内市场不仅是风险缓冲池,更应成为技术验证与模式创新的策源地。借力国内“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可将外贸企业过剩产能转向智能制造改造领域,例如,纺织机械出口商转型为国内服装企业提供数字化生产线升级服务,在服务内需过程中沉淀工业互联网技术能力。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贸易平台打通国内电商数据与海外仓库系统,利用AI算法分析国内爆款商品趋势,动态调整东南亚工厂的产品线配置,实现“国内需求洞察—区域敏捷生产—全球精准分销”的闭环。此外,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技术入股”试点,允许“一带一路”沿线科研人员以专利技术入股中国企业,可破解跨境技术转移的制度障碍,形成“以市场换技术”的反向创新路径。

四是抢占规则制高点需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定义”。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民

营企业应主导构建“中国标准+”区域规则体系。联合东盟国家制定“热带光伏组件认证标准”，针对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优化技术参数，可打破欧美标准对当地市场的垄断；同步推动碳足迹核算方法论创新，建立覆盖“一带一路”的碳排放互认体系。在海南自贸港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探索“境内数据脱敏—境外模型训练—全球商业应用”的新型数字服务出口模式，通过金砖国家数字部长会议等机制推动建立发展中国家数据主权保护公约。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一带一路”沿线覆盖范围，针对大宗商品贸易，设计“人民币计价+黄金担保”混合结算方案，削弱美元汇率波动对贸易利润的侵蚀。

(四) 风险防控：健全外贸预警机制，强化法律保障支撑

当前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已突破传统贸易争端范畴，演变为覆盖政策、法律、技术标准的系统性压制。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单一市场的关税冲击，更是地缘政治博弈、绿色壁垒升级、规则话语权缺失等多重风险的叠加共振。反倾销、碳关税等新型工具成为打压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隐形武器”。与此同时，国际供应链“短链化”“区域化”趋势加剧，部分国家以“去风险”之名行“脱钩”之实，试图通过溯源调查、原产地追溯等手段挤压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空间。在此背景下，构建“风险预警—合规管理—规则博弈—应急支撑”的全链条防控体系，既是抵御关税冲击的战术选择，更是重塑国际经贸话语权的战略必需。

一是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针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应建立动态监测与弹性调整的双层防御架构。在金融工具层面，可通过外汇期货锁定汇率波动区间，利用大宗商品期权对冲原材料价格风险，形成关税成本传导的缓冲带。例如，对美出口依赖度较高的机电企业，可结合订单周期配置远期结售汇合约，将汇率波动对利润的侵蚀控制在可承受阈值内。在政策追踪层面，依托政策性机构的全球风险数据库，实时分析重点市场政局变动、贸易审查动态及技术标准升级趋势，为企业供应链布局提供预警信号。尤其需关注大选周期可能触发的“黑天鹅”事件，提前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区域建立备份产能，通过多元化布局分散风险敞口。

二是强化合规能力建设，跨越绿色壁垒与规则陷阱。在积极发展转口贸易规避美国关税追溯风险时，民营企业需加强出口合规管理，合规应对贸易壁垒。对于转口贸易中的原产地规则风险，企业应建立从原材料采购到加工流程的全程追溯系统，确保区域价值成分、技术来源等关键指标符合美欧审查要求，防止关税追溯导致的合规成本激增。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标志着国际贸易竞争已从成本效率转向环境合规维度。民营企业需加速构建“绿色生产—标准认证—规则适配”的合规体系。在生产端，推动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向氢能冶炼、生物基材料等低碳工艺转型，通过技术升级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在认证端，主动对接国际碳核算标准，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产品碳标签认证，避免因数据缺失或方法差异遭遇关税惩罚。

三是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博弈，从被动接招转向主动出牌。面对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的行为，中国需联合新兴经济体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针对301条款等违规措施发起集体诉讼，以多边规则制约保护主义。在区域层面，依托RCEP、金砖合作等机制构建“南方国家规则同盟”，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输出中国方案。例如，推动建立发展中国家主导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打破美欧通过“数据本地化”条款构筑的市场壁垒。同时，支持行业协会牵头制定重点行业国际标准，将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引导全球产业链向“中国标准+区域生产”模式演进。

四是完善应急支撑体系，统筹好短期纾困与长期韧性。针对关税冲击相伴而来的产业链断链

风险,应建立民生商品战略储备,完善价格联动监测机制,通过定向投放平抑输入性通胀对下游中小企业的冲击。对于就业市场,政企可协同开展新兴产业技能培训,推动劳动力从传统外贸加工领域向半导体封装、工业软件运维等高技术岗位有序转移,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阵痛。此外,探索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基金”,对因关税政策被迫转型的企业,可以对其提供技术升级补贴以及市场开拓支持,避免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危机。

(五)创新驱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人才建设生态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与技术霸权博弈交织的背景下,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已从单一产品禁运演变为系统性的“创新围堵”。目前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核心技术领域对外依存度过高,产学研协同效率仍然较低,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较为薄弱。破解这一困局进一步突出创新驱动的关键作用,通过“自主攻关—数字赋能—人才支撑—开放协作”的协同路径,构建可持续的科技突围体系。

首先,聚焦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破局的首要任务。针对半导体、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可以设立专项攻关基金,通过政企协同的“揭榜挂帅”机制,推动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攻坚。同时,可以强化基础研究布局,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定向增设前沿技术学科,构建从理论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技术转化激励机制,对关键研发成果的商业化应用给予政策倾斜,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周期,提升转化效率。

其次,提升产业链韧性,数字化转型是关键抓手。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传统制造模式,有效地应对关税冲击与供应链风险。同时,可以在制造环节引入柔性生产体系,通过智能排产与质量检测系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对市场波动的响应速度。此外,需加强数字技术标准建设,充分推动我国的优势技术纳入国际标准体系,为民营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规则支撑。

再次,完善人才引育机制是创新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破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困境,需着力构建“培养—引进—激励”的全周期体系。一方面,推动高校学科设置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通过校企联合培养、国际交流项目等方式加大复合型人才的储备力度。另一方面,优化国际人才引进政策,为外籍顶尖科研人员提供便利化服务,充分吸纳全球智力资源参与核心技术的攻坚。此外,推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探索技术入股、长期股权激励等模式,激发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

最后,深化国际技术协作是突破美国封锁的战略选择。在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应主动参与多边科技合作,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研发资源等方式,提升自身创新水平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技术标准互认,将我国的产业领先优势转化为区域合作发展的基石。同时,进一步探索建立跨境研发“安全通道”,在数据可控范围内开展技术联合攻关,一方面可以防范技术泄露风险,又避免与国际创新生态脱节。通过多管齐下系统推进,我国的民营经济有望逐步打破技术封锁,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最终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中掌握主动权。这一过程不仅是应对美国关税压力的必要之举,更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下新型治理理念的战略实践。

参考文献:

- [1] 周建仁,王淇. 2025年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J]. 国际政治科学,2025(1):195–208.
- [2] 徐政,占智勇. 特朗普2.0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挑战与应对策略[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3):135–147.

- [3] 袁征,陈桂芸.特朗普2.0版联盟战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嬗变[J].国际安全研究,2025(2):3-22,165.
- [4] 徐政,郑霖豪.破解“内卷式”竞争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依据与战略构想[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2):48-58.
- [5] 沈国兵.特朗普2.0新政关注点及对中美经贸的影响[J].思想理论战线,2025(2):118-130,141.
- [6] 戴觅,陈君妍.关税削减与消费者福利分配:基于进口份额的新视角[J].经济学(季刊),2025(1):68-85.
- [7] 王如玉,柴忠东,林家兴.全球供应链空间重构下的中国外贸“三新”:新格局、新动能与新质生产力[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8-35.
- [8] 盛斌,靳晨鑫.“特朗普主义”贸易行为与中美经贸关系[J].国际贸易问题,2025(1):19-33.
- [9] 彭晓楠,赵景峰.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外贸高质量发展道路[J].宏观经济管理,2024(10):51-58.
- [10] 邬爱其,吴铁珂,戴维奇.专精特新战略导向赋能中小企业成长的机制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5):85-99.
- [11] 宋敏,聂聪,张学人.危机还是转机:关税壁垒、研发投入与创新质量转化[J].宏观质量研究,2024(3):1-16.
- [12] 姜南,韩琦.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战略与中国因应之策[J].科学学研究,2025(2):254-264.
- [13] 王缉思,贾庆国,唐永胜,等.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24(2):9-49,4.
- [14] 徐政,丁守海,曾丹.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出口企业的生产动态视角[J].系统工程,2021(6):34-47.
- [15] 张夏恒.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2-31.
- [16] 罗亮,陈婷,徐政.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J].学术交流,2024(7):99-112.
- [17] 徐政,张姣玉.新发展格局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价值指向与路径方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2-80,201-202.
- [18] 丁守海,徐政.中美贸易摩擦下加征关税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粤浙闽外贸型企业调研数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72-79.
- [19] 严静峰.美中经济关系冲突的政治经济学论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1(11):78-86.
- [20] 周申,于林可.美国贸易政策转变、劳动力市场冲击与我国的对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1):42-48.
- [21] 王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产业备份共同体构建:必要性与路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94-103.
- [22] 高翔,徐然,史依颖,等.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典型制造业转移路径的启示[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9):2203-2221.
- [23] 孙文浩,张杰.中美贸易战何以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科学学研究,2020(9):1559-1569,1596.
- [24] 高智华,李启文.美国法不当域外适用的中国应对策略探索[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4-122.
- [25] 刘建江,刘甲蒙,唐志良.美国对华战略焦虑的缘由、表征及应对思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4):63-70.
- [26] 巴曙松,王珂.中美贸易战引致全球经贸不确定性预期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基于大宗商品推动路径的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89-98.
- [27] 朱锋.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4):1-14,133.
- [28] 宋国友.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J].太平洋学报,2019(6):64-72.
- [29] 钟飞腾.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6):1-30.
- [30]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37-155.
- [31] 谢地,张巩.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5):121-143.
- [32] 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72-81.
- [33] 雷达.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程度[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5.
- [34] 李晓.中美贸易失衡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8.
- [35] 黄正松,单凌涛,徐政.新质生产力对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来自上市公司异地子公司的经验证据[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81-98.
- [36] 王松,徐政,袁瀚坤.新质生产力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5

- (1):34–42.
- [37] 何伟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鲜明特征及实践路向[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110–123.
- [38] 佟家栋, 谢丹阳, 包群, 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6):5–59.
- [39] 焦兵, 李佳. 新发展格局下推进能源国际合作的历史演进、现实依据与路径选择[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5):103–114.
- [40] 邝艳湘. 经济相互依赖与中美贸易摩擦: 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11):36–43.

Strategic cho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 economy under the U. S. tariff imposition

XU Zheng¹, CHENG Mengyao², ZHENG Linhao³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C. P. C. Jiangsu Committee, Nanjing 210009, P. R.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C. P. C. Fujian Committee, Fuzhou 350108, P. R. China;

3. Mintou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Investment Group, Fuzhou 350005, P. R. China)

Abstract: Since 2025, the accelerated implementation of U. S. tariff increases on Chinese goods has transcended traditional trade frictions, evolving into a systematic suppression tool with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across economic, strategic, political, and technological domains. Economically, it aims to balance trade deficits and enforce protectionism; strategically, to restructur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politically, to divert domestic tensions and engage in geopolitical rivalry; and technologically, to stifle China's innovation leapfrogging and maintain generational advantages. These high tariffs impose systemic risks on China's private economy, including supply chain strain (persistent cost escalation), export contraction (compressed traditional markets), technological containment (fractured innovation ecosystems), and talent drain (restricted high-end intellectual inflows). In April 2025,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naugural proposal of the Asia Security Model at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Peripheral Work marked China's strategic shift from passive defense to proactive rule-shaping in regional governance, offering a new paradigm for private sector resili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a five-dimens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reform and opening-up, government-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market expansion, risk preven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o navigate U. S. tariff pressures. Key measures include: strengthen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cornerstone while promoting dual domestic-international cycles;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policy support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deepen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ilding trade early-warning systems and legal protections; advancing sci-tech system reforms and talent ecosystem optimiz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ounter U. S. trade tactics but also offers a China solution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o break the core-periphery dependenc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integrating reforms into global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China aims to convert tariff crises into historic opportunities for rule-making—a pragmatic response to unilateral hegemony and a strategic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Key words: Sino-U. S. trade war; Asia security mod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dual-circulation strategy; innovation-driven

(责任编辑 周沫)